



朱人求 主编

朱熹易学散论

王 风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朱人求 主编

朱熹易学散论

王 风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易学散论/王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朱子学文库)

ISBN 978-7-100-15406-2

I. ①朱… II. ①王… III. ①朱熹(1130—1200)—
《周易》—思想评论 IV. ①B244.75②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354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朱熹易学散论

王 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06-2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¼

定价:39.00 元

《朱子学文库》编委会

顾 问 陈 来

编委会主任 朱崇实

编委会副主任 陈支平 陈武元

编 委

朱崇实 朱汉民 朱杰人 周桂钿 陈支平 陈武元 吴 震

李甦平 蔡方鹿 何 俊 田 浩(美) 吾妻重二(日)

井上厚史(日) 何乃川 高令印 刘泽亮 乐爱国 杨立华

姜真硕(韩) 苏费翔(德) 杨柱才 徐公喜 方旭东

傅小凡 杨祖汉 杜保瑞 曾春海 吴光辉 谢晓东 朱人求

主 编 朱人求

副主编 刘泽亮 乐爱国

朱子学的精神与未来

——《朱子学文库》序

陈 来

在儒家思想文化史上，有两个集大成的人物。如果说孔子是上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那么，宋代的朱子就可以说是近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朱子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大学者，后人称其学术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在南宋以后，朱子和他的思想对中国乃至东亚的社会文化影响甚大。朱子学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朱子思想不仅统治了南宋以后元明清七百多年的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东亚世界，并演化为东亚世界的统治哲学。不仅如此，《朱子小学》《增损吕氏乡约》《朱子家礼》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礼仪也日益成为东亚民众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朱子学因之成为近世东亚文化的共同信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朱子学仍然焕发着生机和活力，《朱子家礼》在韩国、中国闽台地区仍然发挥着它的部分功能，韩国和中国每年都会举行朱子祭礼来缅怀朱子的丰功伟绩，朱子学仍然存活在我们身边，仍然是我们重建精神世界的活水源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中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意义？换言之，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朱子学？朱子学的精神怎样参与人类未来精神世界的建构？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了解朱子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意义。

1. 文化传承

朱子的文化实践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朱子对古代文化做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辑与诠释尤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

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朱子在孔子以后的文化传承方面做出的贡献，是近一千年以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延续民族文化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重建社会价值的意义。应当学习朱子在文化传承方面的抱负和努力。

2. 主敬伦理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从广义的内心生活态度来讲，敬畏感是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内心态度和感受，其根本必归结到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头上的星空代表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加上心中的道德，这就是朱子讲的天理。“主敬”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从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

3. 学习精神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大学的“格物”朱子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穷理之方法是多种的，朱子特别强调的是读书讲学，其中特别突出学习的精神。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子学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最大的继承、发展、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今天的现代社会在教育程度上已与古代不同，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属于“大学”，所以朱子学几乎适用于今天现代社会的所有人。现代社会越来越是一个“学习型社会”，朱子学的“学习精神”应当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4. 教育理念

除了学习精神，朱子学的教育理念也有其现代意义。从当代大学通

识教育的角度来看朱子的格致论，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的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这些思想都是与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相通的文化资源。

5. 实践哲学

朱子不仅强调知识的学习，而且更为强调实践，这种对实践的强调，特别体现在朱子一贯提倡的“知行相须”“力行为重”上。照朱子的讲法，致知与力行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但论先后，知在先，行在后。论轻重，力行为重。知而不行，就不是真知，真知一定能付诸实践、表现于实践。这种精神合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当代哲学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和关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的精神和近代哲学是相通的。

6. 化民成俗

朱子的儒学思想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所以，其论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天性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伦尽职、尽力尽心。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可得化民成俗之效。朱子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蒙童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以及《家礼》等，在社会上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行，对形成文明的社会礼俗，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朱子这方面的贡献，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近百年来，我国朱子学研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起落消长，虽然有种种曲折，但总体上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尤其 21 世纪以来，朱子学研究开拓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如对朱子的易学、朱子的“四书”学、朱子的工夫论、朱子的经学、朱子的经典诠释、朱子的文学、朱子的自然学，以及朱子后学的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朱子礼学的当代社会实践研究等，都出现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种研究的多元化和广泛性在宋明理学其他大思想家的研究中（如陆象山、王阳明）是很少见的。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对朱子学的研究构成了现如今我们所研究的朱子学的整体，我们今天仅仅是对于朱熹本人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很充分的。如何发展朱子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提高理论的把握和处理朱子学材料的水平，关注较大范围的哲学思考，仍是朱子学研究应当持守的层面。在朱子后学的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发展，只是总体上比起阳明后学的研究来还很不够。就此而言，我们要对各个朝代（宋、元、明、清）的朱子后学的重要见解进行分析，把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如果完成这些工作的话，对于学科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建树。我们应当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朱子后学的研究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进一步说，朱子后学，若只限于一传二传乃至三传的意义，还不能穷尽“朱子学”的范围；从更广的朱子学的角度看，元明清的朱子学家思想群体都应有规划地一步步地开展其研究，成为体系，使“朱子学”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历史得以呈现，使“朱子学”的研究更加丰满。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中国朱子学研究多停留在第一层次，今后我们要大力提倡和发展第二、第三层次的朱子学研究。

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相同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的特色。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风景。未来的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填补空白,走向综合,从整体上揭示和阐释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和朱子学的相互交涉,并予以其思想以正确的理论定位。

反观近世东亚的朱子学(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研究,后来因学科目录中原有的“东方哲学”不再存在,使得相关研究的发展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应继续努力加强其研究。近十年来中国台湾学者尤其是新儒家学者对韩国朱子学加强了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台湾朱子学界近年普遍出现了对牟宗三先生朱子研究范式的一些反省和讨论,也促进了朱子哲学研究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的开展,并将推动整个朱子哲学研究的深化。

最近,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朱子学会积极吸纳全球朱子学专家和学者的最新成果,拟用五年时间出版30册左右的大型《朱子学文库》。这是继20世纪日本发行《朱子学大系》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朱子学著作的大集辑,文库的作者群来自全球各地,主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内容也以东亚朱子学研究和全球百年朱子学研究为主,我认为,这将是21世纪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老一辈的邹永贤教授、

高令印教授、何乃川教授在朱子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为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邹永贤教授主编的《朱子学研究》《朱子学论丛》，在学术界影响颇佳。高令印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朱子学研究，其著作《福建朱子学》《朱子学通论》等在朱子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其作品《退溪学与东方文化》《朱熹事迹考》被翻译成韩文，为韩国朱子研究者所重视。2006年，厦门大学国学院复办，复办后的国学研究院，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组织校内外相关科研队伍，在开展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在推动朱子学、海峡两岸国学研究与互动交流方面，成绩突出。近五年来，先后举办（包括联合举办）规模较大的国际和海峡两岸朱子学研讨会六次，出版朱子学研究专著、译著十余部。2011年9月，朱子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创办《朱子学年鉴》，组织举办多次大型国际朱子学会议，团结了一大批海内外朱子学研究专家，引领朱子学研究走向国际化，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2012年和2013年，厦门大学分别获得“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两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并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朱子学文库》，它也标志着厦门大学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朱子学研究的中心。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未来的路很长很长，我们坚信，发展朱子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要加强规划，抓紧开展，促进国际交流，利用目前重视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使朱子学的研究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是为序。

目 录

朱子学的精神与未来

——《朱子学文库》序	陈 来 1
------------------	-------

易学史上性理与象数之关系问题

——兼评纪昀“两派六宗”说	1
---------------------	---

“《易》本卜筮之书”与占学方法

——兼论程朱易学之一脉相承	10
---------------------	----

“先天学为易学纲领”与新道统说

18

“《易》只是个空底物事”与《周易本义》卷首九图

26

王弼易学对朱熹的影响

43

程门易学对朱熹的复杂影响

58

朱熹对程氏易学的支持以及对苏氏易学的批判

70

刘牧活动年代及其著作考辨

——兼论《遗论九事》非刘牧作品	84
-----------------------	----

刘牧对周敦颐、邵雍可能发生的影响

——兼论朱震易学传承谱之可疑	95
----------------------	----

《易传》与《周易本义》关系考辨

106

从《朱子语类》看《周易本义》成稿过程

117

《易学启蒙》的内容及朱、蔡二人各自的贡献

134

《答袁机仲》十一书的写作时间

——兼论朱熹晚年绘制伏羲次序图	148
-----------------------	-----

“无形而有理”

——朱熹的太极之学 155

“无心涵有象”

——朱熹的先天之学 172

易学史上性理与象数之关系问题

——兼评纪昀“两派六宗”说

关于朱熹易学，有主张属于义理派的，有主张属于象数派的，有主张属于融象数义理为一体的，有主张部分内容属义理、部分内容属象数的。关于义理派与象数派孰优孰劣，又存在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理为易学之本，一种意见认为象数为易学之本，还有一种意见折中于二者之间。因此，朱熹易学之属于义理派还是象数派，就不单为事实判断，且为价值判断。

今人用象数、义理对分格局评断古今易学，常常以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序》的“两派六宗”之说为例。《易类小序》回顾易学史，提出：“汉儒所言象数，去古未远，为一宗；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襍祥，为一宗；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为一宗。此三宗为一派。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为一宗；一变而为胡瑗、程颐，阐明儒理，为一宗；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参证史事，为一宗。此三宗为一派。是为‘两派六宗’。”今人解读《易类小序》，认为：“这种以义理为《易》之本，象数为末，将易学概括为‘两派六宗’的说法，基本上把握了易学发展的规律。”^①在哲学受重视的今天，这样解读《易类小序》，能得到很多学人首肯，但遗憾的是，纪昀本意并非如此。

学人解读《易类小序》，经常忽略一个情况，即“两派六宗”列举京房、焦延寿、陈抟、邵雍、王弼、胡瑗、程颐、李光、杨万里九家易学，似乎是择焉不精的。西汉田何、施雠、孟喜、梁丘贺《易》都得立学官，

^① 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京氏《易》依附孟氏，在短暂得立之后复废，地位比不上四家显豁，“两派六宗”有京、焦却不及四家。东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的易学并称四大家，“两派六宗”未及四家。费氏《易》在两汉传承不绝，一直影响到三国曹魏时期的王肃和王弼，史家溯源，多称述费氏《易》，而“两派六宗”未及费氏。虞翻在易学史上十分有名，“两派六宗”也没有提到。朱熹易学与程颐易学并立于清代学官，“两派六宗”有程颐却无朱熹。那么，纪昀的“两派六宗”说为何会如此疏略呢？

这里首先要排除草率为之的因素。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以博学卓识著称，毕生精力萃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元度《纪文达公事略》说：“乾隆三十有八年，纯皇帝特开四库全书馆，以河间纪公为总纂官。公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经传注得失，诸史异同，子、集支分派别，以及词曲医卜之类，罔不抉奥提纲，溯源竟委。每进一书，仿刘向、曾巩例，作提要冠诸篇首，上辄览而善之。又奉诏撰《简明目录》，存书存目多至万余种，皆公一手所订，评鹭精审，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藏诸七阁，哀然巨观，真本朝大手笔也。”^①《郑堂读书记》作者周中孚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编矣。”^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篇为数百字的《经部总序》，紧接其下即《易类小序》。作为镇于篇首的短短序文，应当精思而又审慎，不可能草率为之的。

纪昀撰写《易类小序》疏略田何、施雠、孟喜、梁丘贺、费直、荀爽、刘表、马融、郑玄、虞翻，是不是由于他和他的同事对汉学缺乏足够了解？这一点也不必担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曰：“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政府方面文化事有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曰编纂《四库全书》。”又说：“《四库提要》这部书，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页。

②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页。

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①梁启超的结论未必确当，然四库馆臣群体的汉学造诣的确无可怀疑。纪昀及其同事对汉《易》之熟知，可从汉《易》诸书提要得见。例如，《周易郑康成注提要》曰：“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于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实为传《易》之正脉。齐陆澄与王俭书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崇儒，郑注不可废。’其论最笃。唐初诏修《正义》，仍黜郑崇王，非达识也。”^②从这篇提要看，纪昀不但熟知郑氏《易》，而且认为从费直经马融到郑玄的“费义”一脉“实为传《易》之正脉”，进而批评孔颖达不应当黜郑崇王，明白地表现出汉学立场。又例如，《易汉学提要》曰：“国朝惠栋撰。……其以虞翻次孟喜者，以翻别传自称‘五世传孟氏《易》’；以郑玄次京房者，以《后汉书》称‘玄通京氏《易》’也。荀爽别为一卷，则费氏《易》之流派矣。……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费氏学自陈元、郑众、马融、郑玄以下，递传以至王弼，是为今本。然《汉书》称直‘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又《隋志》五行家有直《易林》二卷，《易内神筮》二卷，《周易筮占林》五卷，则直《易》亦兼言卜筮，特其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说，与孟、京两家体例较异。合是三派，汉学之古法亦约略尽此矣。夫《易》本为卜筮作，而汉儒多参以占候，未必尽合周、孔之法。然其时去古未远，要必有所受之。……孟、京两家之学当归术数，然费氏为象数之正传，郑氏之学亦兼用京、费之说，有未可尽目为讖纬者，故仍列之经部焉。”^③这篇提要简明概括汉《易》孟、京、费氏三流派，认为孟氏、京氏应当归于术数，而费氏为象数之正传，表现出在象数方面尊费氏而又不舍弃孟氏、京氏的某些因素之意。这些学术评论，说明纪昀和他的同事对汉代易学深有研究。《四库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② 《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一，《周易郑康成注·提要》，文渊阁本。

③ 《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一，《易汉学·提要》，文渊阁本。

全书》所收惠栋《易汉学》八卷，底本采用另一位总纂官陆锡熊家藏本，也反映出，纪昀和他的同事对汉《易》是熟知的。

如此看来，纪昀和他的同事没有理由疏略田何、施雠、孟喜、梁丘贺、费直、荀爽、刘表、马融、郑玄、虞翻和朱熹的易学。“两派六宗”未提到诸家，当另有隐情。我们来看《易类小序》全文：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襍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于左。^①

序文可分四节：“圣人觉世牖民”到“盖犹太卜之遗法”为第一节，“汉儒言象数”到“已互相攻驳”为第二节，“又《易》道广大”到“故《易》说愈繁”为第三节，“夫六十四卦”到“非其本也”为第四节。第一节，认为圣人寓教于卜筮而作《易》。第二节，历数汉代之后“两派六宗”，认为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到京房、焦延寿则入于襍祥，到陈抟、邵雍又务穷造化，于是象数一派遂不切于民用。至于义理一派的王弼、胡瑗、程颐、李光、杨万里，也不过是日启论端，无所归著。这就总体地否定了象数、义理两个流派，且具体地批判了六宗中的五宗。第三

① 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排印、影印本，第2页。

节，在“两派六宗”之外，又批评杂家之援《易》立说，好异者之援以入《易》，造成易学混乱。第四节，认为自孔子以来，如《大象传》之因象立教者，方为易学之正宗，凡偏离此道者，都是易外别传，不是正宗。这篇序文，一方面批判襍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以及杂家易说，认为它们或不切于民用，或日启论端，另一方面提出三个主张，即“圣人寓教于卜筮而作《易》”“《易》因象以立教”“《易》多戒占之辞”，一正一反，构成一篇有破有立，观点鲜明的论文。其所破者，是篇中列举的“两派六宗”之襍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其所立者，是《大象传》以来的因象立教传统。而这种因象立教之学，竟然不在“两派六宗”之内。

《易类小序》提出“两派六宗”，是为了批评否定其中各宗，至于它不想批评否定的田何、施雠、孟喜、梁丘贺、费直、荀爽、刘表、马融、郑玄、虞翻和朱熹的易学，自然不必列入“两派六宗”之内。也就是说，《易类小序》既没有试图用“两派六宗”概括整个易学史，更没有试图肯定义理派或象数派。它推崇的易学正脉，是因象立教、寓教于卜筮的君子之学，这样的学问不能简单地归入义理派或者象数派，它逍遥于“两派六宗”之外。

朱熹易学中象数的内容丰富清晰，不像王弼、程颐易学中的象数那样简省隐蔽。同时，朱熹易学讲太极，讲人极，讲阴阳，讲仁义，讲性命，讲修身，讲扶阳抑阴，讲穷理尽性，其义理的内容也同样丰富且清晰。更重要的是，朱熹易学重视卜筮，主张因象立教，被后世称为“象占之学”，它很接近《易类小序》推崇的易学正脉。因此，纪昀没有把朱熹易学归入两派的某派，六宗的某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原本周易本义提要》，仅考证版本，不作点评，不断定它属义理派还是象数派，可能基于同样考虑。

当代学界断定朱熹属于义理派的，并不否认其中有象数内容，例如朱伯崑说：“朱熹的易学，对筮法的解释，虽然吸收了河洛图式和邵雍的先天易学，但仍然属于义理学派；或者说，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吸收象数学派的某些观点，以补其不足。”^①断定朱熹属于象数派的，也不否认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